

后现代史》

## “天下主义”与“知识权力”

文 / 杨念群

大家都知道，晚清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曾提出有名的“中体西用”说，即在保持我们核心文化价值的同时，在器物方面学习西方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想法。

可惜张老先生最后还是扛不住，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部

### 谁来定义“中国人”？

到了近代，我们何以成为一个“中国人”的理由，都变得模糊起来了。

举个例子，有位先生曾说，要改变中国的形象，就得跟西方白人多结合，多生白人孩子。这个逻辑到如今还在不断延续。甚至有个别打着知名名义经常跑出来指点公众“应该这样，应该那样”，批判这个，批判那个，到最后自己还是跑到美国去生孩子，因为孩子生下来就成美国公民了。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有一位学者对此曾做过非常精彩的概括，她认为：当代学界往往根据什么东西不是“中国的”，而来决定什么是“中国人”。这种现代性病症说明，我们作为“中国人”的自信心不足，就算有所谓自信，表达得很勉强。比如说，功夫片里的李小龙动不动就一脚把洋鬼子从台子上踢下来，或者咚

### 历史没有目的，也不客观？

在“后现代”学者看来，历史的所有“目的”都是虚幻的，历史也没有规律可寻，试图找出历史规律的尝试，只能是假话。

当然，从“后现代”理论的角度说，循环论没什么不好，循环也可能是一种有质量的运行方式，历史的质量会逐步的提升，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通过“进化论”模式就能彻底加以解决的。

因此，下面我们打算谈谈一个新话题：从“现代性”到“后现代”与“后殖民”的演变历程。这个演变过程的特点是什么呢？首先要讲一讲“后现代”思潮。它大致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核心观点：

第一，“后现代”绝对不承认有什么客观性的历史。传统的近代历史观，动不动就强调我们要客观地、真实地去判断历史，“后现代”理论则说，历史从来不是客观的。该理论认为，历史永远是主观的表达，只

分也遭到西方文化摧毁，被打得七零八落，最后全面向西方投降，进入一个向现代转型的状态。有人说，如果西方列强不侵略中国，中国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。我不大相信这样一个判断，历史也不应该如此假设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完全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，被逼无奈地向西方学习，

咚咚把日本人暴揍一顿，还有中国的各路武林高手，三拳两脚就把老外打得满地找牙。那种虚构影像中力图展现的“自信”，恰恰是内心极度软弱的一种表现。这就是所谓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危机。

从空间上看，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“天下主义”向“国族主义”的转变。什么叫“天下主义”呢？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是也。我们从王朝的中心可以无限地往外推，华夏永远可以推广到任何一个蛮夷居住的地方，这个文化的优越性是相当强大的。大家如果读过有关宋代的一些传奇小说，比如《说岳全传》、杨家将故事等，对“天下主义”是如何自我膨胀这一点，就会很清楚。

要你写下某段历史的那一刹那，历史就进入到“书写”的状态，是某人写下的历史，而不是真实的历史。

既然历史没有客观性，只是主观书写的结果，那么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线就开始模糊了，在历史研究过程中，自然也可以发挥个人想象。所以，持极端“后现代”观点的学者干脆说：历史就是文学，文学就是历史。但我个人认为，文学和历史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。你可以说历史书写不是客观的，不过历史学家要得出某个判断或结论，必须去搜集史料，提供一定证据，并一条条加以证明，而文学家可以不这么做，文学描写不需要证据，区别就这么简单。搞文学你可以直接玩穿越，历史

才不得不走上西方（或类似于西方）的道路。

这就造成“我们何以是中国人？”这个问题，在历史上头一次需要由外来的价值系统加以判定。因为我们内部的自身传统已不足以提供让我们成为“现代中国人”的基本条件，并由此引发了国人日益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。

在历史上，宋人被金人、辽人打得很惨，总是寡不敌众。可在传奇小说里，还是硬撑着说咱宋朝最牛，辽金不过蛮夷而已。我们小时候看《说岳全传》，都觉得岳飞这样的猛将真了不起，其实宋朝军队跟辽金基本没法对抗，岳家军好一点，杨家将就没有什么大的战绩，一查《宋史》这类正史就知道真相，但后人确实把岳飞和杨家将夸张成了一个神话，一套传奇，传奇背后的根子就是：我们文化是有优势的，宋朝的地盘虽然不断缩小，文化却依然优越。

可惜，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认你这一套，不是光靠你自己吹嘘文化如何优越就可以作为竞争的筹码，实际上靠的是利益交换和实力博弈。这一变

学家玩不了穿越。

第二，历史只有断裂，没有连续性。你不要跟我说，“从古到今中国就是怎么怎么样”，历史归历史，什么“自古以来”，后现代绝对不承认，哪个时代就该处理哪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，不能越界，把不同时代的问题当作所有时代的问题混同起来。前一个时代的问题与后一个时代的问题往往互不衔接，处于断裂的状态。

第三，历史的非目的性，即历史本身没有目的。1991年苏联解体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，美国学者福山写了一本书就叫《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》。他认为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历史的终点，因为连苏联都崩溃



李小龙名作《精武门》英文海报（片名大意为“狂怒之拳”）。他在影片中出色地演绎了一位担当“东亚病夫”的武术家的英雄形象，而作为蜚声世界的功夫巨星，他本人一度成为中国人寻找力量与自信的精神偶像。

化非常巨大，在空间上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解。

在“天下主义”时代，中国人“拥有”的空间确实很大，可以无限地往外延伸。而从时间维度看，我们的历史观中最尊崇的，是远古的夏商周“黄金三代”，我们习惯于思慕过去。但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潮流，则要推动我们拼命往前奔跑，要按照进化论的观念认识历史趋势。所以，如何从中国传统的“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”的螺旋式循环论，慢慢走向服从于进化论的历史演进观念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。

了，不可能再有什么变化了。但后来有人质疑：美国的模式就是历史的终点了吗？不可能啊，你看美国现在多狼狽啊，到处出兵打人，最后造成大量叙利亚难民在欧洲到处跑，美国也不管人家，于是欧洲人就纷纷骂美国，说你太不够意思了。所以美国那套制度，好像也不是那么完美。

在“后现代”学者看来，历史的所有“目的”都是虚幻的，你别搞一套远大目标来忽悠我。再有就是，历史之间具有非因果式的联系，历史过程不是由一定的因产生一定的果，历史的产生和演变是一个非现实性的“碎片化”结果。历史没有规律可寻，试图找出历史规律的尝试，只能是假话。

### 知识是“力量”还是“权力”？

“后现代”理论宣称：“知识就是权力”。力量和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你获得了很多知识，不见得你会获得很多力量。

大家还要记住，“后现代”有个中心词叫权力。不管什么样的历史观背后，都有一个权力之手在操纵它。如果说历史有规律，这个规律肯定就是所有的历史都是由某种权力在幕后起着支配作用。

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这是我们小时候老师经常提到的一句话。“后现代”理论则宣称：“知识就是权力”。力量和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你获得了很多知识，不见得你会获得很多力量，获得某种力量时，你会表现得像个肌肉男一样，好像无所不能。福柯（1926~1984年，法国思想家）一下子把这个神话打破了，他说任何知识的背后都有一只权力之手在操控，什么权力在制约着你使用什么样的知识。在这一点上，“后现代”理论显得非常有说服力。

比如说，二战时美国的核物理学家们会认为，我们掌握了知识，制造出原子弹，就是对人类做出的极大贡献。结果，原子弹问世导致了“核冬天”的可怕前景，有可能带来人类的灭顶之灾。你觉得这些科学家们拥有的知识，就一定产生正当的力量吗？值得怀疑。这种空前的力量背后，肯定受到政治权力之手的操纵，有关核物理的知识获得了某种“导向”，做出了某种特定的选择。知识不可

能置身于政治权力的操纵之外，这就是“后现代”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个相当深刻的启示。

话说回来，我不完全能够接受“后现代”的所有理论。但我欣赏它的批判态度，它会让我重新质疑很多早年被潜移默化灌输的理论，让我明白，很多自中学时代起教科书上所写的“正确的结论”，其实都值得怀疑。

读“后现代”理论的书，它会给你一些新的启发，提醒你脑子里不要不加辨别地把某些概念和说法作为讨论的前提。比如说“封建社会”，我们以前接受了“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处于封建社会阶段”这种笼统的判断，会不加思索地跟着走、跟着说，现在你可以做出选择，从此不跟着说了，你心里要想知道“封建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“封建社会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至少应该清楚，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定义的“封建”，与从历史认知的角度去寻求“封建”的意义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只有这样，你的脑子才会变得聪明一点。学习历史不要盲从，研究历史就是怕盲从。

作者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，清史研究所教授、博导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。文稿由吕文利等记录整理，经作者审阅。

民国金融小史》

## 京钞风暴百年祭(上)

文 / 徐瑾

1916年可谓是北洋政府波折之年，政治趋向乱局，先是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，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，西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，这使得脆弱的北洋政府面临更大窘境。没有监督以及严格的财政纪律，政府的账最终往往都是银行承担，北洋政府的窘境也让中国

### 政府赖账 银行着慌

拒绝兑付原本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因为发的钞票太多，已经无法兑付，如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所言，“内外债方面，业已无法可想；如因军政各费，继续增发钞票，必将引起提存挤兑风潮，银行可能即将倒闭，局面将不可控制”。据他估算，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钞票七千万余元，其中交发行额为三千六十八十二万元，库存现金只有两千万元，放出高贷约两千万外，贷给政府的约有四千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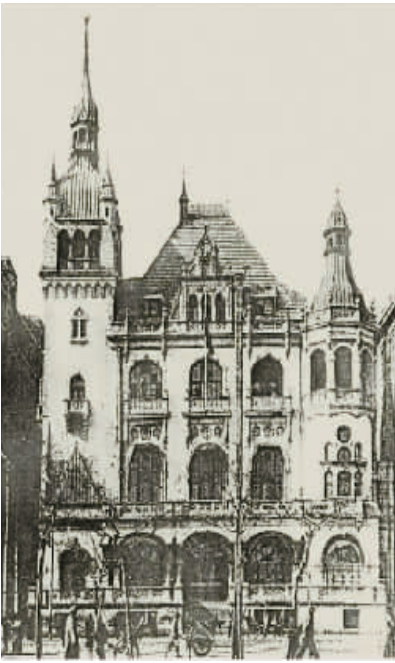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的发行数额，自然跟后来的法币金圆券无法相比，但因为当时的钞票并不是法币，白银还是作为主要货币在使用，金属货币的通胀不容易很高，这也是北洋政府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原因。可惜当时格局之下，超额额度加上各种流言，已足以让市场中人心不稳。

银行和交通银行陷入滥发纸币深渊，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信用面临考验。

袁世凯的谋士梁士诒长期控制交通银行，面对无计可施的财政漏洞，他和段祺瑞心腹徐树铮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。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消息走漏反而导致市场挤兑爆发，从京津开始蔓延，风波愈演愈烈。

账面怎么都无法做平，无奈之下，北洋政府不等新财长孙宝琦上任，就在1916年5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令：中、交两行停止钞票兑现和存款兑现。“停兑令”中称：“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，国家银行纸币有暂时停止兑现及禁止银行提取现银之法，以资维持，俾现款可以保存，各业咸资周转，法良利溥，亟宜仿照办理，应由财政、交通两部转飭中、交、交通两银行，自奉令之日起，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，暂时一律不准兑现，一俟大局定后，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，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两行一律封存。”

“停兑令”一出，摆明了政府要赖账，银行无计可施，市场就此一片混乱，纸币的价格愈发走低。鲁迅对此事念念不忘，详细记录了前后经过：



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旧影。

“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，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，到云南去起义。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，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。虽然停止兑现，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；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，说不不要，却道找不出零钱。假如拿几十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，我不知道怎样，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，一盒烟卷呢，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？不但不甘心，也没有这许多票。那么，换铜元，少换几个罢，又都说没有铜元。那么，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，怎么会有？于是降格以求，不讲爱国了，要外国银行的钞票。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是现银，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，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。”

### 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

这一事件，显然严重影响了刚刚树立的中国银行业的信用。从鲁迅上述记录中，也可见外资银行的独立性保证了其钞票的可靠。数日后，京津两地两行完全停止兑付，日渐加剧的贬值预期之下，人们纷纷抛售纸币，抢购商品，于是市场更加混乱，人心日益惶惶。

此次钞票挤兑风潮从北方开始，当时钞票称为“京钞”，所以也叫“京钞风潮”。鲁迅最后只好打折出售自己手上的钞票，他写道：

“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，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，几乎要绝食，很有些恐慌。俄国革命以后的戴着纸卢布的富翁

### 挤兑的噩梦成真

拒不执行，并不代表不计成本与一味顽抗。张公权与宋汉章最大的担忧是，因为抗命他们会被北京政府解除职务，而一旦解职可能会面临无人顶上的困境。于是两人借助租界法律，私下让中国银行的商股股东起诉自己，这也意味着他们在起诉期间无法擅离职守，也无法被解职。

张公权回忆，这是为了抗挤兑成功，借助股东力量抵制袁氏政府。在大企业家张善帮助下，中行上海分行成立新的股东联合会主持业务，张公权被推举为会长，叶葵初为

的心情，恐怕也就这样的罢；至多，不过更深更大罢了。我只得探听，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？说是没有的独立性保证了其钞票的可靠。数日后，京津两地两行完全停止兑付了：六折几。我非常高兴，赶紧去卖了一半。后来又涨到七折了，我更非常高兴，全去换了现银，沉沉垫地坠在怀中，似乎这就是我的生命的斤两。倘在平时，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，我是决不答应的。”

这种近乎抢劫的行为令百姓惶恐，更令金融市场不眠不休。身处当年中国金融中心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，也毫不例外接到了“停兑令”。

时任上海分行总经理的宋汉章、副总经理的张公权接到命令之

副会长，钱新之为秘书长，在报刊刊登公告表示，上海分行营业照旧，并且对外宣布：

“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，莫如上海一埠，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，且为中外观瞻所系，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；且证之辛亥大清银行全体瓦解，幸沪上有股东会之设立，竭尽全力以维持沪行，沪行因赖以保全。”

努力保住现有管理层之后，上海分行还必须从经济上证明，自身的实力可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挤兑浪潮。挤兑是所有银行家的噩梦，更可怕的

是这噩梦常常变为现实，张公权多年后回忆当日情形，仍心有余悸。

5月12日早晨8时，张公权从家里去上海分行，离银行还有三个路口时，即见排队的人已经挤满。他勉强挤到银行门口，发现挤兑者估计不下2000人，“争先恐后，撞门攀窗，几乎不顾生死。”这些升斗小民人数虽然多，但是索取数目并不大，张公权注意到，他们手中所持的不过一元或五元的钞票数张，或二三百元的存单一张而已。（未完待续）——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，近期出版《印钞者》一书。